长征中的安徽担当与奉献

朱贵平／文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长征，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壮举和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按现行行政区划统计，安徽虽然不是红军长征途经的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之一，但与红军长征关系密切，安徽人民为长征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金寨县红军广场沐浴在霞光中，为庄严肃穆的革命纪念建筑群镀上了金色的光辉。　徐旻昊/摄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皖南行动掩护策应主力红军长征

1934年7月，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中央根据地的压力，并掩护中央主力红军长征，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对内仍称红七军团）名义，先行向北进军，到达皖浙赣边区和皖南地区创建新的苏维埃区域。此次行动被誉为“长征序曲”。部队由军团长寻淮洲率领，从瑞金出发，经福建、浙江两省，于9月25日抵达皖南。10月15日，进至秋浦黎痕（今属东至县）一带休整将近半个月。皖南人民热烈欢迎，热情帮助。先遣队每过一村，沿途群众敲锣打鼓、鸣放鞭炮，并备茶、备饭，供路过红军食用。皖南苏区被服厂为先遣队战士提供了一部分服装、被单等物品，红军医院安置了一批先遣队伤病员，妇女慰劳队为伤病员洗去血垢，缝补衣服，送鸡、肉、蛋、糖去慰劳部队，还为红军先遣队赶做了一批布草鞋。当地红军游击队4个连共500名战士加入先遣队，并筹集一部分枪弹补充给先遣队。10月底，国民党军重兵“围剿”皖赣苏区。先遣队南下到达赣东北苏区的江西省德兴县重溪，与闽浙赣军区的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由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等人率领，继续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兵分两路，出击浙皖边，创建皖南新苏区。12月6日攻占旌德县城。12月10日在黄山汤口会师，军威大振。蒋介石急电浙皖赣三省“会剿”。12月14日，在黄山谭家桥一带，红军与国民党追兵展开激战，损失惨重。12月18日到达皖南苏区中心黟县柯村休整3天。之后，部队在歙县、休宁、祁门的崇山峻岭中与国民党军周旋，逐步陷于被动局面。1935年1月全军南返。月底，红军在江西玉山县怀玉山遭国民党军围攻，方志敏被捕后牺牲，粟裕率800多名红军将士突围到达浙南一带开展游击斗争。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皖南行动，在短短6个月的时间里，转战闽、浙、赣、皖诸省，一次又一次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经历几十次战斗，牵制国民党军队十几万人，减轻了中央苏区的压力，策应和掩护了长征初期中央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

在反对王明、张国焘错误路线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1935年1月15日，长征路上，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安徽泾县人王稼祥，作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出席会议。会议首先由博古代表中央，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敌人过于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尖锐指出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绝不在于客观，而是由于博古、李德顽固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实行单纯军事防御，在战略战术上犯了一系列错误，主要表现为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一时间，会场上鸦雀无声，气氛紧张。关键时刻，第一个就毛泽东发言进行表态的是王稼祥，他旗帜鲜明地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发言，建议撤销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毛泽东应该参与军事指挥。王稼祥的发言引起强烈反响。朱德等人相继发言表示支持，会场形成了“一边倒”的局面。遵义会议取得重要成果，取消“三人团”，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不久，王稼祥与毛泽东、周恩来组成三人军事小组，全权负责红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王稼祥是从博古、李德的“左”倾教条主义营垒中分化出来的第一人，是提议召开遵义会议解决党内领导权问题的第一人，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毛泽东后来曾说：“王稼祥是最早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一票。”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四川懋功，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北上抗日的决定。8月红军过草地后，原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自恃“山头”大、人数多、装备好，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并大造舆论，煽动对党中央的不满情绪。红军总部侦察科科长、安徽舒城人胡底公开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被以国民党特务的罪名秘密杀害。王稼祥在朱德的授意下找张国焘谈话，耐心细致地做张国焘的思想工作。张国焘出尔反尔，甚至密电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为避免红军内部冲突，毛泽东、周恩来等率红一、三军和中央纵队一部先行北上。张国焘则借口“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未解决，拒绝北上，引兵南下，另立中央，走上了一条分裂主义路线。在大是大非面前，中央纵队卫戍部队司令、原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安徽巢湖人李克农，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并协助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以外出打粮为名，将军委直属队安全带离险境。在红四方面军内部，直属中央军委领导的红军大学教导师第二团团长、安徽金寨人皮定均，具有很高的政治敏锐性，很快识破了张国焘的野心，断然与其划清界限，并积极向学员宣传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批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在皮定均影响下，二团很快觉悟起来，并影响到整个教导师的学员，还通过他们影响了红四方面军大部分官兵，有力地制止了张国焘掀起的一股反党分裂逆流。

安徽儿女以青春和生命浴血奋战创造奇迹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兵分左、中、右三路强渡乌江，占领遵义。右路为红一军团的一师、十五师及红九军团。第一师参谋长、安徽阜南人聂鹤亭率杨得志的第一团为先遣队，顶风冒雪，迅速抵达贵州余庆县境的回龙场渡口。在聂鹤亭和团长杨得志的精心组织下，部队一面以强大火力压住对岸敌人，一面组织十多名勇士以仅有的一条小船强渡乌江成功，迅速占领了北岸滩头阵地，保证了主力部队顺利过江。

在中央红军长征的队伍里，有一位特殊的文化战士、安徽枞阳人、时任中央军委直属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黄镇。黄镇自幼习画，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长征路上，他随身携带一盒铅笔和一叠毛边纸，创作大量反映红军战斗和生活的写生画，鼓舞斗志。1962年，《长征画集》出版，成为研究长征历史仅有的形象史料和珍贵艺术品。

参加长征的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红四方面军，1931年11月诞生于鄂豫皖苏区，安徽子弟占了很大比例。1935年3月底，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踏上长征之路。安徽籍指战员以洪学智、陶勇、皮定均、杨国夫、徐立清、曾绍山、滕海清、张贤约等为代表，大部分为一线部队指挥员、战斗员，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建立不朽功勋。长征途中，因张国焘推行分裂主义，红四方面军被迫南下，转战于川康地区，发起百丈关等多次重大战役，虽然重创敌军，但自身损失惨重；加上部队两次翻越雪山、三次跋涉草地，历尽艰辛，许多安徽籍红军将士或血染沙场，或牺牲在爬雪山、过草地途中。

四支长征队伍中的红二十五军，1931年10月诞生于六安麻埠，半数以上指战员都是皖西子弟。从红二十



安徽省博物馆“烽火江淮——安徽革命史陈列”“红色沃土　红军摇篮”板块，通过图片、文字、实物等，再现了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　张耀东/摄

五军走出近百位开国将军，安徽籍38位。1934年11月上旬，红二十五军从金寨南溪葛藤山开拔，抵达河南罗山县何家冲。16日出发长征，于12月10日进入陕南，开辟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7月中旬，部队再度西进北上，留下一些兵力在商洛山中，由鄂陕游击师师长、安徽金寨人陈先瑞领导，转战于鄂豫陕三省边界24个县境。到9月，经历大小战斗上百次，牵制敌人十几个团的兵力，掩护主力红军长征，部队发展为红七十四师，由几百人增加到1700多人，陈先瑞被誉为“陕南王”。9月16日，红二十五军在陕西延川永坪镇与刘志丹率领的西北红军会师，率先完成长征，被誉为“长征先锋”。会师后，参与直罗镇等战役，为党中央和红军落脚陕北、把中国革命大本营建立在陕甘宁边区，创造了条件。

在长征的队伍中，后勤保障战线上安徽人贡献突出。1935年6月，中央红军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粮草发生严重困难。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安徽金寨人洪学智立即组织民运部、保卫部等机关和直属队，连夜出发，翻山越涧，打开几个反动头人的寨子，筹集到几万斤粮食和几百只牛羊，交给中央纵队，并圆满完成了中央红军伤病员的转送和安置工作，受到刘少奇的高度称赞。1936年春，红四军进入四川甘孜一带休整，洪学智带领政治部，模范执行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对当地喇嘛上层和藏族头人开展统战工作，成立藏族人民政府，解决了红军的粮食供应问题。

后勤保障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医疗救护。红一方面军中央纵队高干休养连有一位内科医生、安徽六安人孙仪之负责医护工作。长征途中，孙仪之用中草药给毛泽东治好了咳嗽，为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和邓发的夫人接生并安置好孩子。红四方面军总医院中医部主任、安徽金寨人丁世方，医术高明，救人无数。红六军团卫生部部长、安徽合肥人戴正华，曾任国民党军队的少校军医，被俘后参加红军，许多重伤员在他的救治下转危为安。后勤战线上还活跃着一群安徽女兵。周东屏，安徽六安人，红二十五军医院护士。长征路上，她精心护理身负重伤的红军首长徐海东，使其转危为安。长征到达陕北后，二人结为伴侣。林月琴，安徽金寨人，红四方面军妇女工兵营营长。长征路上，她率妇女工兵营筹集、运送粮草和弹药，抬担架，历尽艰辛。1937年春与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结为伴侣。周起义，安徽金寨人，红四方面军医院看护长、女子警卫连指导员。她自幼缠足，凭着一双“三寸金莲”，爬雪山、过草地，走完长征路。彭素，安徽金寨人，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护士连连长、担架营营长。二过草地时身患重病，坚持“当红军，干革命，就要准备吃苦”的信念走完长征路。汪荣华，安徽六安人，曾任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巡视员、省苏维埃政府邮政局副局长。她深入藏族群众聚居区帮助部队筹集粮草及过冬的衣物，出色完成任务。1936年10月，与刘伯承结为伴侣。

皖南皖西三年游击战争从战略上支援配合主力红军长征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皖南作战失利、全军南返前，方志敏留下一个侦察营，与皖南红军游击大队合编组成皖南红军独立团，以皖南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至1935年上半年，创建了以鄣公山为中心的皖浙赣边游击根据地。与此同时，中共泾（县）旌（德）宁（国）宣（城）中心县委在泾旌宁宣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纵横百余里的游击区。中共江南特委在贵（池）秋（浦）东（流）地区的秋浦高山一带发动中秋暴动，建立江

讲好长征的历史故事

周良书／文

1936年，红军刚落脚陕北，中共中央便发起《红军长征记》的征集工作，号召所有亲历长征的指战员，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这场发生在窑洞里的集体写作，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主动对长征历史进行叙事建构。九十年过去，当我们回望这段特殊经历时，会发现长征故事的传播早已跨越单纯“历史记录”的阶段，进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全新语境。但与此同时，长征的叙事也出现诸多值得警惕的倾向。部分内容将长征矮化为“求生逃亡”的功利化叙事，部分讲述陷入“说教式灌输”的困境，让年轻受众对长征故事产生距离感。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构建一套科学完整的叙事体系，让长征故事既能守住历史的根脉，又能真正走进当代人的内心。

尊重历史事实

历史叙事的第一属性是“客观性”，任何脱离事实的叙事，本质上都是对历史本身的消解。长征的故事，是红军战士用双脚一步步丈量出来的征途，是湘江战役里染红江水的热血，是雪山上冻僵后依然保持前行姿态的躯体，是草地里用草根和皮带撑出来的行军路。这些真实发生过的客观事实，是所有长征故事的根基，没有这个根基，再华丽的叙事也只是空中楼阁。

其实，真实的长征，比任何编写出来的故事都要令人震撼。在《红军长征记》中，没有任何刻意美化的情节，没有回避行军中的狼狈与窘迫。有战士记录自己在草地里迷路三天，靠喝沼泽水才追上大部队；有炊事员吐槽自己背着几十斤的铁锅走完全南特区苏维埃政府，覆盖方圆百余里。1935年秋，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关英率省委机关到达鄣公山，联络分散游击的红军武装，集中整编、统一思想、统一步调。1936年4月，将中共闽浙赣省委改组为中共皖浙赣省委，下辖赣东北、皖赣、上浙皖、下浙皖、开婺休（后改为浙皖）5个分区委、特委。皖浙赣边区以皖南为大本营，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屡次粉碎国民党重兵“进剿”，对国民党军“围剿”红军长征形成有效牵制，在战略上有力支援配合了中央主力红军长征。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主力红军长征后，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在安徽太湖凉亭坳（今属岳西县）召开干部会议，将留下的红军及伤病员不足3000人组织起来，第三次组建红二十八军。红二十八军以岳西鹞落坪为大本营，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游击战争。7月2日，在太湖县店前河（今岳西县店前镇）召开干部会议。会议提出游击战的“四不打”原则：一是敌情不明不打，二是地形不利不打，三是伤亡过大不打，四是缴获不多不打。会议之后，红军充分发挥小部队灵活机动的特点，取得一系列战斗的胜利。同时，在鄂豫皖边区22个县发展便衣队80多个，拥有600多人。星罗棋布的便衣队，牢牢扎根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让国民党鄂豫皖边区“剿匪”督办公署无可奈何。到1936年夏秋季，游击区扩大到皖鄂边区10多个县，成为南方八省三年游击战争中面积最大且唯一保持红军军级建制的游击区。据统计，三年游击战争中，红二十八军艰苦转战于鄂豫皖边区45个县，多次粉碎敌人的重兵“清剿”，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牵制国民党大量正规军，最多时达68个团，约30万人，歼敌18个营又15个连和大量小股敌军，在战略上有力配合了红二十五军长征。毛泽东曾评价：红二十八军很不容易，很有成绩，很了不起。□

［作者为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院（安徽省地方志研究院）学术和编审委员会原主任］

欢迎扫码收听